

供内部学习用

整党学习资料

(4)

中共广东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印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一九八四年十月

“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

金 春 明

中共广东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翻印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副教授 金春明

同志们让我来讲一下“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想根据自己对学习《决议》的理解，谈谈这个问题。总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现在大家都同意了，但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本来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正式作了结论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就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经过《决议》的学习和宣传，这个结论已经比较普遍地被接受了。最近随着全面整党的深入开展，这个问题又重新引起党内外很多同志的关切和注意，报刊上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评论和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党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讲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不能离开这十年，对这十年的正确评价是很重要的。但它的意义决不仅仅限于党史这个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只有搞党史的人，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很关心。因为“文化大革命”问题是建国以来，特别是五七年以来在我们党内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的一个极端的表现。所以认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彻底地拨乱反正，肃清“左”的影响，提高觉悟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它关系到能不能彻底纠正和肃清长期以来成为错误的主体的“左”倾错误的问题。因为它是这种“左”倾错误的极端表现，所以，若不能彻底否定，就不能彻底纠“左”。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的实践。所以，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直接关系到对

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而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正确评价，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三，“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建国以来最丰富的经验，当然这个经验主要是反面的经验，但又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所以能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又关系到能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能不能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能不能自觉地为实现“十二大”所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而奋斗的问题。我们常常讲拨乱反正，建国三十多年来最大的“乱”莫过于十年内乱，拨乱首先要拨“文化大革命”十年之乱，把它搞清楚，然后才能返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所以在这次整党中，如果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上到下都能真正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那是一件大好事，是一项最根本的思想建设，也是真正实现“十二大”开创新局面纲领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深讲透，就要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我自己水平不高，研究不够，感到这个任务很艰巨。领导上要我来讲，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又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好在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具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老同志，又有实践经验，“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大家都亲自经历过，具有丰富的感性知识。我主要是把自己从事这段党史教学和研究的一些体会，接触到的材料，向同志们作一汇报，准备从五个方面来讲：

一、“文化大革命”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我们党犯错误的产物。讲一下“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方法都是错误的。

三、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四、“文化大革命”本身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值得肯定和继承。这个问题准备涉及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对群众组织的看法，对支“左”的看法，对“红卫兵”的看法，对所谓反官僚主义的看法等等。

五、对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和十年的历史要加以分析和区

别。这里想着重讲一下怎么看待这段历史，特别是怎样看待十年当中毛主席他老人家所犯的错误。

一、“文化大革命”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呢？因为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文革”中，认为“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的保证，是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重要保证。而且讲，因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蜕化变质了，我们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及时地搞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就可保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是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流传的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是上了党的文件的。在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就讲，“‘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所以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弄清楚这样一些说法是不对的。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些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任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都要搞的那种革命，不是非搞不行的，恰恰相反，是不能搞的。“文化大革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是谁搞谁倒霉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首先应从理论上弄清一个问题：我们所搞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文化革命。过去把这两个东西混淆了，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是有意把这两个东西弄混的。文化革命这个术语，最早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首先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那些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列宁认为，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他把实现文化革命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页）列宁讲的

文化革命包括什么内容呢？是指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样一个文化革命，列宁明确指出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搞的。特别是那些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搞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更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党开始明确提出要搞文化革命是一九五八年，那时毛泽东同志写过一篇文章，叫《介绍一个合作社》，提出要进行五个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久，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为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对文化革命的内容作了五点规定：①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渐做到一般的乡有一个中学，一般的专区和许多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②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推行汉字改革。③消除“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人们的精神。④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⑤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设一支成千万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队伍，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五条同列宁讲的文化革命内容是一致的。为了宣传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文化革命开始了》，社论提出，文化革命就是全国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就是说，一九四九年打倒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在政治上已翻了身，后来又搞了所有制的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经济上翻了身，现在需要搞一个文化翻身运动，然后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很显然，这样的文化革命，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的。但是我们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样的革命，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批判开始的，首

先从批《海瑞罢官》开始，然后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批《前线》，然后各地搞批判，然后各地学校停课闹革命，关闭学校，大学不招生，所以这个“文化革命”是从破坏文化开始的。

十年的结果怎样呢？我给它概括了这么几句话，叫做学校关闭破坏，教育质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加（前年人口普查时统计，全国文盲二亿三千万，比“文革”前大大增加），文艺界百花凋零。文艺界一开始就把很多电影都给“枪毙”了，戏剧一个一个都没有了，最后就剩下“样板戏”“八朵花”。文艺队伍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许多科研单位被解散，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排除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与地富反坏右并列，而且排在第九，叫“臭老九”。这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一种反常现象，叫做知识越多越反动，有文化的反动，无知识的光荣，不但如此，而且把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良好社会风尚破坏了。五十年代的社会风尚大家都经历过，而且得到全世界赞扬。“文化大革命”则是以野蛮为革命，谁野蛮，谁最会骂人、打人，谁“最革命”，所以舞台上就变成了红卫兵拿皮带跳舞，喊叫“滚他妈的蛋”。谁打人打得最积极，谁“革命性”最高，就是响当当的左派。就象敲银元一样响当当的，这是一种市侩语言。所以这样的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它除了首先是从文化界开刀之外，与发展繁荣文化没有联系，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那种文化革命，恰恰是一场对文化的大破坏。杨献珍同志讲了一句很风趣的话，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颠倒一下顺序就可以了，把“文化大革命”，改成“大革文化命”，这比较合乎实际。所以，首先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讲了，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我们搞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了。我们搞的是加了引号的文化大革命，加了引号就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文化革命，但又找不到别的什么适当词来代替它，所以就加了引号，作为一个特定名词使用。

我们搞的不是文化革命，那么是不是“政治大革命”呢？“九

大”报告讲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毛主席有语录，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应该讲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我们搞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政治革命。因为在我们国家，一九六六年时没有这种政治革命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八大”正式通过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那么在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十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当时无产阶级已经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又要去发动亿万群众去推翻那种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这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吗？如果真有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当然是应该推翻的，但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阶级统治，却又号召亿万群众起来推翻，当然是错误的。关于什么叫政治革命，革命导师有过明确论述。恩格斯说：“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恩格斯又说：“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11页）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我们所讲的革命，都是为了推翻那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所有制，建立一种能够保护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所有制，要以这个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叫作政治革命。如果离开这个基础，那就无所谓政治革命。在一九六六年，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有缺陷，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社会主义公有制却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不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保护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虽然这种政权也有弊病，也不完

善，但本质上还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以，在我国不存在进行政治革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说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那么这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是谁呢？最后找到了一种人叫“党内走资派。”因为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已经打倒了，找不到了，所以找来找去就找到共产党里来了，说共产党里掌握政权的那些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了十年的结果证明，这是个虚构的敌人，打了十年，到底谁是走资派？并没有走资派，全国都没有。打了十年结果不是打了“走资派”，是打了自己。用耀邦同志的话说，是自己整自己，是共产党整共产党。所以，“走资派”是一种主观虚构的敌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我们国家，既没有“走资派”，也没有“走资派”所有制。所以这种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那种政治革命。

那么它是什么呢？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所谓触及灵魂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质上是说它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是不是一场思想革命呢？马克思主义是承认思想革命的，但我们搞了十年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思想革命呢？应该回答，也不是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的世界观是需要改造的，没有天生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工人阶级既不能自己创立科学的思想体系，也不能自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自发地掌握科学的宇宙观。所以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外部灌输进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的思想是不需要改造的。当然，对剥削阶级的改造和工人阶级的自我改造，是两种不同含义的东西，但需要改造是共同的。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这样一种改造呢？不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提出所谓“自来红”的观点，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红五类”等，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把另一些人作为被改造的对象，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改造。而那种方法是不能改造世界观的。关于怎样才能改造世界观，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他

说：“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是通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周总理特别强调指出，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概括起来就是思想改造需要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各种社会实践。我觉得周总理总结的经验，不仅适用于知识分子，而且适用于人民内部所有的人。周总理在报告中还强调，“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创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用什么办法进行思想改造呢？用什么办法去触及灵魂呢？恰恰使用了与上述马克思主义教导相违反的方法，不是依靠本人的自觉，而是粗暴地靠外力、靠强迫；不是认真地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地机械地去背诵语录；不是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而是轻率地开展所谓批判斗争。而这种所谓批判斗争，又常常混淆了是非界限，混淆了业务探讨和政治是非的界限，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无限上纲，是非颠倒，乱打乱斗。“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办法不仅是简单粗暴，有时是野蛮的，是侮辱人格的，很不人道的办法。用这种办法去改造世界观不可能触及灵魂，只能是触及皮肉，只能增加思想上的抵触和反感，而不能使人自觉。前几年青年中出现信仰危机，有些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恰恰是那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干着很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所造成的一种后果。“文化大革命”不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且打着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干了很多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当然更不是经济革命。

列宁曾给革命下过这样的定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时机就要瓦

解的上层建筑。”（《列宁选集》第一卷616页）这是对“革命”所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我们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论述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是历史的火车头。但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动乱，决不是我们所要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不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不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既然如此，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呢？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由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个人是指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起的巨大作用，但是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个人。而且，个人的意志也不是主观自生的，它是社会历史因素的反映，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都深深地打着毛泽东同志的烙印，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不能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应该说它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党内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左”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左”的思潮发展的结果。列宁说过，机会主义不是某个人的罪孽，而是一种社会思潮。我们可以借用这句话来讲。“文化大革命”当然是毛泽东同志的严重错误，但它又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它是一种社会思潮。概括地讲，“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我们党内不断发展的“左”倾思潮的产物，是党内“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极端表现。如果作一点具体分析，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的系统化，

并被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了对私有制改造后，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新课题。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十五年，完成了集体化，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当时是有争议的。一九三五年，斯大林在宪法报告中作了总结，提出苏联社会已没有阶级了，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发展靠团结与和谐一致，人民团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结论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不完善的方面。说阶级基本消灭是对的，但说阶级斗争没有了就错了。正因为斯大林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就发生很大的矛盾。斯大林对这些矛盾无法解释，在理论上说明不了，最后归结一条：凡是同他在党内发生矛盾的，都是帝国主义间谍，都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颠覆力量。在这个错误理论指导下，苏联发生了肃反扩大化，把中央委员肃掉一半，最后把红军总参谋长也肃掉了。到了这种地步才不能不刹车。肃反扩大化，根源在于没有对苏联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理论上的概括。这个问题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我们党在“八大”前后就面临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有贡献的。党的八大作了正确的论断，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讲了论十大关系，一九五七年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有贡献。应该讲，剥削阶级虽然基本消灭了，但其残余仍然存在。因此还有阶级斗争，但已不是主要矛盾了。主要的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党的八大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个前进，比斯大林那段是个发展。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有了个良好的开端后未能继续前进。一九五七年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们党改变了这一正确认识。这时国际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全面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很大恶果，使整个国际共运发生了一次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搞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高潮，国际共运受到很

大损失。在这种反共潮流影响下，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一些事件，最突出的是波、匈事件。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都是由于某种原因，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政府。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党和人民之间没有对抗性矛盾。但是由于特殊的条件，由于党的政策错误以及其它因素，波兰、匈牙利的群众起来反对政府。这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发生给我们党一个很大的震动。毛主席讲，这个问题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毛主席说一九五七年有两件事我们没有料到，一件是国际上出了波匈事件，一件是国内出现右派进攻。我们是从一个方面总结了经验，认为匈牙利所以出了反革命事件，是因为镇反不彻底，阶级斗争没搞好，我们要吸取教训，抓阶级斗争。加上五七年整风中发生了极少数右派进攻。现在有一种议论，说五七年没有右派，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有右派的，根据确凿的证据，五七年确有右派，但数量很少，而且当时也不一定采取那种搞全国性运动的方法。根据复查结果，当时全国定了五十五万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复查平反了98%多一点，剩下不到2%，大约全国有一万多右派。这一万多还不是纯粹的右派，这里有“双料货”：有的是历史反革命或有其它历史问题，又有一点反动言论，就划为右派了。就是说真正的右派比这个数还要少。在我们这么一个国家，有一点右派，万把人，不算大问题。但当时对形势的估计严重了。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前后讲过两句话，开始讲“微风吹皱一池春水”，后来讲“黑云压城城欲摧”，认为如不反击，有些党组织就可能要垮台。于是就动员全党反击，一反击，一搞运动，就扩大化了。由于这两件事的影响，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错误，这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本来“八大”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已经解决。但隔了一年多，到了八届三中全会就讲，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还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整个政策的出发点。因为主要

矛盾看错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接连发生了“左”的错误，形成了一种“左”的思潮，并且不断发展。由于主要矛盾搞错了，阶级斗争对象也就搞错了。“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我国存在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两个劳动阶级指工人和农民，两个剥削阶级指老的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且出现一种理论，说老的资产阶级由于其所有制被我们改造，它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能同我们争夺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本钱，能够与我们争夺领导权，所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变成主要的打击对象了。五七年反右派就是这样打击了知识分子。这样五七年以后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左”的思潮，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为主要内容的“左”的思潮。

这种思潮从产生到成为在党内居支配地位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十年发展过程中有两次会议起了关键性作用：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开始是要纠“左”的，后来由于彭德怀同志写了信，转到批右了。中央现在已重新作了结论，认为五九年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是错误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批判，使得在阶级斗争理论上有个重要的升级，就是毛主席批示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直接引伸到党内来了。毛主席五九年的论述同他过去的论述不一样，有本质区别。在《矛盾论》中毛主席讲：“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反映，不是直接的继续。是讲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矛盾并不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矛盾论》是三七年写的，当时中国是个阶级社会。到五六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应该说作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的那种矛盾是越来越少了，作为新旧事物和其它矛盾在

党内的反映则越来越多。可恰恰在这时，毛主席改变了过去的正确论断，认为党内矛盾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直接继续。后来所以能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就跟这种理论有直接关系，是这种理论的直接引伸。

第二次重要的升级是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阶段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了，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谓扩大化，就是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所谓绝对化，就是把某一阶段存在的阶级斗争延伸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没有到来的社会怎么能事先肯定它存在呢？经过八届十中全会，这个理论成为党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基本路线”。所谓“基本路线”，就是根据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由王力整理又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发表的。这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就逐步系统化、完整化了。“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它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八届十中全会形成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搞“四清”，后来扩展到城市叫“五反”，以后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搞的，一搞就抓出了一批所谓的“阶级敌人”。“不搞不知道，一搞吓一跳”。认为吓了一跳之后就检查右倾，就反右倾，然后再去抓，结果更“左”了，抓得更多了，就再吓一跳，再检查右倾，再去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去进行错误的实践，错误的实践反过来再为错误的理论提供错误的材料，使错误的理论更发展，再指导搞错误的实践。结果，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互相促进，“左”得越来越厉害。

到一九六五年，在党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估计：第一，农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毛主席讲过的，但最早作这样估计的不是毛主席。据我们接触到的材料，是一个省委

汇报的。他们在汇报“四清”情况时说，我们这里搞“四清”试点发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毛主席说你这个估计不错。这样一来，别的省汇报时说得很多。有些人的东西起了更恶劣的作用。如陈伯达的关于天津小站的情况报告上来后，中央就发了一个在农村部分地区进行夺权斗争的指示。真正讲夺权的文件，这是中央发的最早的一份。还有“桃园经验”也起了一点作用。这是农村的状况。工厂呢？叫作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工厂的这个概念从那里来的呢？也是从下面的报告中来的。当时有几个著名的报告，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的报告，说整个的领导班子都被坏人篡权了，这个报告是谢富治搞的。当然下去的同志并不都是坏人，有一些很好的同志，由于受“左”的影响也搞了这样的报告。比如甘肃白银厂的报告也是很有名的。就是说，你思想“左”了，下去搞调查非“左”不行。这些东西毛主席批转全国，发生很大影响。毛主席说中央是个加工厂。下面这些报告，毛主席感到证实了他头脑中关于阶级斗争严重的想法，所以就作了结论，说工厂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文化界情况怎么样呢？更糟。六三、六四年毛主席有两个文艺批示，也是有人给他写了报告的。第一个批示是江青给他搞的材料。他批示说，文艺界大多数协会基本上是错误的，“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如何呢？也很糟，叫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党政机关也不好，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各个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对形势作这样一种错误估计，怎么办？毛主席开始作决策了，感到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就得搞一种形式，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搞一种彻底的运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到这时，毛主席对中央也就不相信了。六五年底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还特别问了部队的同志，问了几个大军区司令员，说中央出了修正

主义你们就得学蔡锷，要造反哪！这就很尖锐了，造成了一种虚幻的，但又使人感到很紧迫的那么一种危机感。这样一种危机感，加上错误地接受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就考虑接班人怎么办？有一次，毛主席与外国党的领袖谈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们年岁都很大了，要考虑选接班人了，将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接我们的班呀，是考茨基呀，还是赫鲁晓夫？要早作准备，现在准备还来得及。这样一种综合的考虑，使毛主席下了决心，要搞“文化大革命”。

第二，是错误的党内斗争和个人崇拜的狂热，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发生和难以防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仅仅是党的领袖个人错了，或是党内一部分人错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很健全，我们是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来防止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未能防止呢？我想特别提出：一个是错误的党内斗争，一个是个人崇拜的狂热，都起了重要作用。错误的党内斗争，特别突出的是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从“七大”到建国后的前一个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还是比较健全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受到明显的严重破坏，五九年庐山会议是重要的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在小组会上发了言，后来又给毛主席写了信，那封信后来加了个标题，叫意见书。对这个标题，彭德怀自己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给中央写的信，并不是意见书。这封信的内容现在看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对于全国形势，党内大事有意见，给中央主席写信，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但却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并且扩大了。不仅中央全会批判，搞了一个“反党集团”，而且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打击了党内敢讲真话的同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庐山会议后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在党内只能批右、不准批“左”，只准反右、不准反“左”，结果越批越“左”。在经济方面，谁提的指标越高，谁就越革命；谁实事求是，谁就“右倾”，谁讲大话、空话，谁讲的革命词藻多就最革命，这就严重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破坏了党和